

台灣文學名著 24

# 打牛涌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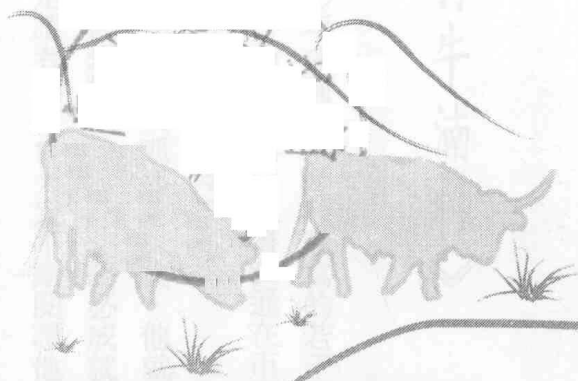
〔宋澤萊◆著〕



第十三届全国书市样书

# 打牛浦村系列

宋澤萊 著



新新版序

## 廿三年再回首《打牛浦村》

宋澤萊

《打牛浦村》那一類的作品，是指一九八〇年之前四年間，我寫的若干鄉土短篇小說而言。計有《打牛浦村系列》《等待燈籠花開時》《蓬萊誌異》三書流通在市面。

自《打牛浦村》一書問世以來，到今天，已經過了廿三年之久。

作品與作者的關係像極了兒女與母親那種關係。兒女呱呱落地後，他就此脫離了母體而獨立存在，他有自己的生命歷程；即使母親再如何想控制他，他也終必成就一個母親也無法預先測知的新奇風貌。這個無法預測的風貌正是讀者和社會大眾不斷閱讀他、品評他、淬煉他，而慢慢得到的結果。

這麼多年來，曾數度再讀《打牛浦村》這些小說，只得承認他愈來愈像是個謎。倒不是我不再管他、關心他，而是他已被淬煉成我亦難以辨識的面容，很難用始初的觀念去解釋他。

就像一個白髮蒼蒼的老母親，作者反而必須向別人打聽，問問當初被生下來的這個小孩，現在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孩子。

這廿三年來，我總算知道了《打牛滿村》這類小說的若干消息：

比如曾聽到一些留學美國的學生說，由於太想念故鄉，他們就把這幾本小說放在枕頭邊，在閱讀後使自己能安然入眠。

也知道有些仁慈的法國、德國女性在學習中文的過程中，閱讀《蓬萊誌異》而淚流不止，甚至撰寫了《打牛滿村》的碩士論文。

好幾年前，還常接到不少電話，說他們和我一樣是成長於農村而後流落於都市的人，他們極高興《打牛滿村》喚起他們幼年、青少年時期的回憶，在書中，他們不斷反芻著生命一度有過的苦澀又可貴的經歷，他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個貧窮又善良的原鄉。是每隔一段時間，他們都會再翻閱這些小說的。他們自稱是「打牛滿村的一代」。

這些消息，使我感到驚訝不已。

對於自一九八〇年後，他在文壇的影響力，也同樣使人驚奇：

在一九九五～二〇〇〇年之間，王世勛創辦《台灣新文學》雜誌，爲了在雜誌上介紹一九八〇～一九九九年之間的本土文學，我翻閱了三十位以上的作家作品，發現在八〇年代仍

有大量友人沿著《打牛湍村》的路線進行創作，而把鄉土文學墾拓得更寬更大。甚至到了九〇年代，還有不少新人類作家在《蓬萊誌異》一書中找到小說的靈感，他竟然可以做為一種創作的泉源。

凡此，豈是當初所能預料？

近來「小說即是虛構」的理論在文壇相當盛行。常被許多人問到：「《打牛湍村》之類的小說到底是實在的，還是虛構的呢？」通常我會告訴他們：故事在現實上皆有所本，至於虛構，那要看你怎麼看，或者說作者怎麼寫。

但就在今年，無意中在兒子的書架上讀到了一本流行的自傳《乞食囡仔》，作者署名賴東進。這是一本描述一個乞丐家庭幸或不幸的真故事。由於賴東進先生的年紀和我相差無幾，他所傳達的台灣五〇、六〇甚至七〇年代的社會背景即是《蓬萊誌異》的背景，他的自傳故事也像極了《蓬萊誌異》裏的一些故事。其實那是一個農鄉極其困頓的年代，不但乞丐窮，一般人都很窮；不只是賴東進的母親生了十二個小孩，一般的媽媽也都生了五、六個小孩；不只是賴東進的父親拿棍子猛打妻兒，所有的父親也都拿著棍子打妻兒。其實，只要不談尊嚴，乞丐與一般農鄉家庭又有何大的差別。我甚至看到更多的家庭破滅，而年輕父母自殺身亡的悲劇。總之，因為貧窮，什麼事都發生了！賴東進的自傳適足以回答《打牛湍村》

之類的小說是否真實的這個問題。

廿三年，不能算短，台灣也在這段期間飛躍成長起來，它足以叫賴東進由窮人變成一個公司的老闆，同時也可以讓「打牛浦村一代」的陳水扁當上總統，〈打牛浦村〉、〈蓬萊誌異〉卻不會在書市消失，和我自認的「一本書頂多只能在書店擺五年」的看法大相逕庭。

是的，不論台灣如何演變，社會永遠都不乏有廣大的窮人。只要人能不忘本，願意反思自己一度有過的困乏生活，並在當中求取教訓，那麼〈打牛浦村〉這一類的小說將會繼續被閱讀下去，它正是貧困世界的一個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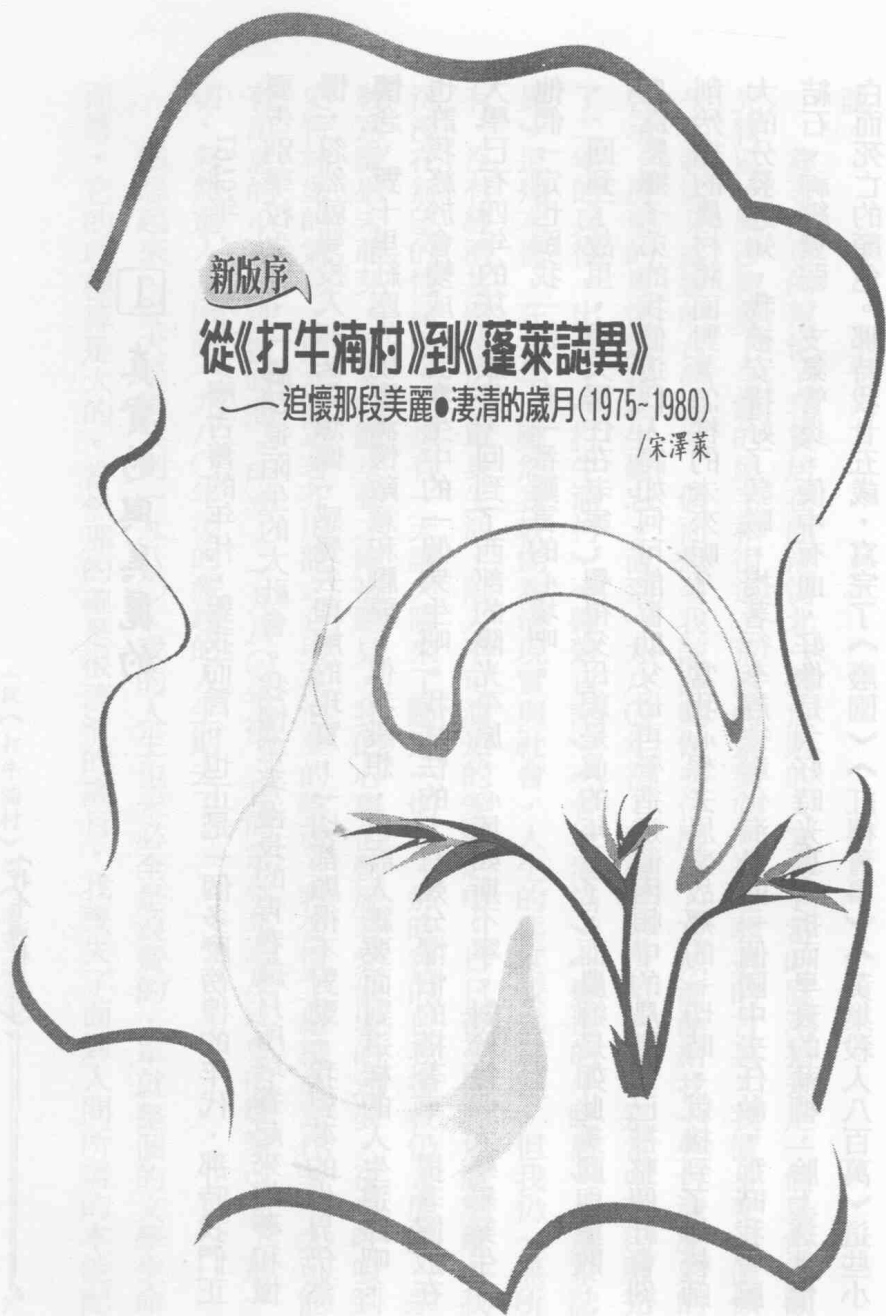
感謝您購買這本書，但願您由書中所得到的樂趣及人生智慧能遠遠超過您付給書店的價錢。

新版序

# 從《打牛湍村》到《蓬萊誌異》

——追懷那段美麗●淒清的歲月(1975~1980)

/宋澤萊



## ① 真實的與美麗的

1975年，看來是多麼古舊的年代，對我而言，也正是一個多麼徬徨的年代，那時我們正要告別學校生活，一腳踩進陌生的大社會。我懷帶著漫長的青春歲月所培養起來的夢和憧憬，忽然就要投入無法靠想像、感覺去理解的現實，一切都顯得不對勁。我對夢的世界仍然懷念，對十里紅塵的現實滿懷敵意和厭惡，但我設想，也許人總要面對這樣的人生道路吧，也許我終於會變成芸芸衆生中的一個衆生吧。我怯怯的、有幾分懼怕的搭著車，提著置放在大學已有四年的灰塵旅袋，回到了西部的陽光平原，心境如斯不寧。對於每個大學畢業生，他們一定也跟我一樣，有一番難言的心境吧。

回到了故里，重又居住在老家，覺得父母親是真的年老了，而農鄉是如此美麗與窮敗，身為農鄉子弟的我們這代人將如何可能協助父母再營造這個困頓中的農鄉？已被整個社會剝削殆盡的農村將面對著怎樣的未來呢？……當我心想去思索故鄉的一切時，就接到了母校師大的分發通知，我被安排好了教職，提著行李趕往彰化海邊的一個國中去任教，那時我腎臟結石、神經衰弱、支氣管炎、便中有血，好像是大好時光裏自折而早衰的蒲柳，臉上透著慘白而死亡的顏色。那時我廿五歲，寫完了《廢園》《紅樓舊事》《黃巢殺人八百萬》這些小

說。

靠著同事的幫忙，我賃居在鹿港街北一個魚販的人家裏，當時鹿港猶未是一個民俗的觀光特區，風沙掩蓋了全鎮的屋宇和街道，荒涼的景象如同被埋葬過的古墓。我置身在這個似乎又親切又遙遠的台灣古城，偶而想著我該計劃做些什麼事。古城漸漸給我一些台灣歷史的啓示，房東的恩情讓我終生難忘。直到一九八〇年初，我搬離了房東的家。這當中我已服完了二年的兵役，出版了〈打牛浦村〉〈糶穀日記〉〈骨城素描〉〈變遷的牛眺灣〉〈蓬萊誌異〉這幾本書，在這年，雖然我較能看清現實與社會，人生的態度較為篤定，但我仍一無所有，沒有經濟基礎、仍然單身生活、陷入不可測知的愛戀之中、日日被憂鬱和焦慮襲擊，我沉浸在無望的情緒中，總想有一天讓大限來了斷這一切吧。那時我的自我拯救仍未展開，宗教意識猶未萌芽，歷史的腳步聲才剛被聽見，我的心裏仍盤旋著愛倫坡的幻夢，夜裏呼吸到史特林堡的氣息，白天籠罩著芥川龍之介與莫泊桑的陰魂。我習慣了繼續靠寫作著不太可能有出息的小說來排遣時間。所幸，一九八〇年後，我的宗教意識及社會的驟變改變了那一切，忽然進入了所謂一九八〇年後的激越的人生期去了。

回想起來，從大學畢業到一九八〇，我的人生也未全是浪費的，單就整個的文學生命而言，它的收穫算是大的。當然那的確是很淒清的歲月，我喪失了面對人間所需的本能配

備，乃至不能鼓起任何的愛、意志、勇氣，生活被剝奪了主動和主觀，日子爲之變成單純、透明。但也就在那種極其透明如同玻璃的生活中，映現了現實生活的真貌，那些善良的、殘暴的、美麗的、醜陋的、真實的、虛偽的……人間相，得以明晰地映現於我的心靈底片中。在真實的、美麗的這部份，我悠然地見到了台灣西部草花的鄉景、屏東明耀陽光的海面、閃爍霓虹的黃昏鎮街、霧夜的港口燈火、雲氣瀰漫的環山部落……我懷著想用藝術創作將自己由精神破毀的邊緣拯救出來的可笑想望，日以繼夜地記下我見過的山、海、平原景色。如此，我構造完成了1975～1980間的那些長短小說，這些小說反映了我的人間掙扎，卻也反映了與我同樣處在共同經濟生活水平下的無數人們的共同命運。乍看，它們都是普泛的小民小說，但要談及它們的文學特質及人物類型，還要讓我仔細地把這幾年的生活慢慢道來。

## ② 寫實主義時期

這是指「打牛浦村」這一系列小說的創作期。共有四篇作品，包括〈笙仔和貴仔的傳奇〉、〈花鼠仔立志的故事〉、〈羅穀日記〉、〈大頭埃仔的布袋戲〉。如今我們台灣文學

所謂的寫實主義是極其不類於原來法國巴爾札克或俄國托爾斯泰的寫實主義內涵的。在法國，它是相應於新興的市民階級所產生的一種文學主義的，就是托爾斯泰的重要小說，主角都還是貴族、地主、將軍之類的人物。但我們台灣所強調的寫實則是一種泛百姓的生活描寫，在日據時代賴和、楊逵、呂赫若這些人所創造出來的，一開始就被殖民地的文學性格所決定，反映著下層民衆的生活，帶有濃厚的反政治體制、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色彩。

對我而言，寫作這種文學是必然的，但不是在我預設下產生的，也就是說我的社會意識在當時不強烈，與其說我有意揭發這些社會的弊病，勿寧說是由於我的一種人生的基調——對人間懷著譏笑——所產生的文學型式。原來1976年的夏天，我就註定以一名歷史教師的資格，宣告進入社會，擺在眼前的路途只有二條，一條是我可以再考研究所唸書；一條是持續一貫的懶散，以教書爲謀生的工具，從此度完沒有希望的人生。懶散及厭世使我選擇了後者，我相信奮鬥是多餘的。在鎮日的逡巡頹喪中，我常藉著教師的社會關係出入一些場合，那幾乎是各種婚喪喜慶及迎神賽會，我的心居然隨著理想的喪失與生活的庸俗化而獲得意外的穩定。很快地，我學會了喝酒、抽煙及一套似真似假的客套禮法，把青春拋擲於一片的空無中。但在另一面，無可掩飾的，我的文學遊戲還未結束，大學四年，以文學做爲逃避現實的習性未泯，有時我仍會有很深的想寫作的慾望。多少次，我在理智清醒時假想，也許文學

不過是人生階段中的一種消遣把戲而已，一旦時期一過，她終會消失如春水無痕。但是隨著社會接觸面的擴大，我日益陷入憂思和譏諷之中。現實世界簡直是一個騙局，它的複雜遠非大學剛畢業的我所能想像，我開始動心，想著是否可以重拾文學，狠狠地拆穿這世界可笑的假面具。這時鄉土文學漸漸流行起來了。

提及鄉土文學，在大學時代，我是不知道有這種東西的。過份耽溺於內心世界，使我在大學時期寫了幾本內心小說。在行將離校時，我偶而看到了黃春明、陳映真、王禎和的一兩篇小說，卻不以爲然地擱下來。那時，恰巧有個人介紹我到東海花園去找楊逵。事實上，當時我去東海花園，並不是因爲看上了楊逵的文學，而是因爲我聽說他在綠島被關了十幾年的事。我只是持續大學時期對人間悲慘事件的關心去找他。是常常去的。卻也在言談中認識了日據時代的若干文學作品與文學活動。這種交往是直到他去世爲止的，我知道不少楊逵與人的恩恩怨怨。我自然是無力爲楊逵的一生做評斷，但我理解，做爲一個第三國際的學徒及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他比誰都更單純。他真的有一工人無祖國及勞動者同體大悲的精神，清純地懷想著世界會進入一個理想國，這不是日後一些現實短視的評論者所能理解的，那時我就想，也許我能仿同日據時代的文學家去反映一些被壓迫者的心聲罷。但是我仍對楊逵一再提及的「社會主義」這名詞不清不楚。

我開始自以爲是地尋找寫作的型式，想用一種古樸、反技巧的敘述方法來從事我的現實描寫。當時我正看傳統的中國小說（尤其是宋元白話小說，它的古樸和傳奇色彩使我吃驚），我想也許通過型式上的仿古，能使小說的內容更接近客觀的事物現象。當時我的題材被決定於唯一我所能認知的現實——農村。我開始寫下了第一篇「打牛浦村」——〈花鼠仔立志的故事〉，並把稿子藏起來，只送一份給在東海花園認識的至友林梵，而後停止再試。我認爲這一篇並不是我所要的寫實小說。除了有趣以外，它的寫實性因爲我諷刺的意圖而被削弱了。我也正在想，是否用傳統中國的傳奇寫法能勝任這個平凡、苦悶多於驚奇的台灣農村現實。不久我接到徵兵令，必須停止教學，於是我離開了學校，進入軍隊，這時已經是1976年的10月了。

軍隊的生活剛開始時是忙碌的，因爲我必須重回成功嶺去做三個月的預官訓練，體力的巨大負荷使我不能想及其他。成功嶺後，進入鳳山步校接受入部隊前訓練，期間也是三個月。當時我久年的腎臟病仍未消除，靠著一些漢方來消除結石所引起的腎疝痛（西藥的樂治寧在大學畢業後已停止使用，因爲它帶來神經衰弱的副作用），我在軍隊裏一面怕因病而被除役（台灣人認爲不當兵是恥辱），卻一面又勉爲其難地在軍隊受苦，在步校三個月中，我感到難過，也感到十分緊張，寫作的事被逐出九霄雲外。六個月如年渡過，極其僥倖，我抽

中了一支日後決定我一系列小說內容的籤，被分發到東港一帶的海岸線，充當一名警戒著海防線的預官。在開始的六個月裏，我的工作是在東港特檢官，巡視鳳山以迄枋寮一帶的漁船筏管制，這是一個出乎意料輕鬆而能與社會環境保持緊密關係的任務，絕大部份的時間我留在林邊鎮集裏的中隊部，沒有太多的外務，我的戰友都是從部隊裏被淘汰下來的等待退役的老士官，日日作息在這種休養多於操練的營地裏，使我仿若避居到一個養老的病院裏來了。

鬆懈下來的生活及過多的空閒，使我能回想昔日的煙塵往事，服役時的遊子情懷往往引起征人的濃重鄉思，我的思緒很容易地飄回了故里，飄回了操勞著體力的父母身邊，農村的一景一物因思鄉的情緒被培養成巨大的影像，盤踞在腦海。高屏一帶的亞熱帶草林也使我憶起幼年的農鄉景色，許多的記憶被帶引出來了。大致看來，屏東一帶的農業是比中部的農業要粗放一些，單位面積也比中部大，陽光和雨水使這兒的草木倍加旺盛，我在復甦的記憶之初，提筆寫了〈大頭坎仔的布袋戲〉，就是這篇小說讓我的農村描寫落實了下來。我親切地寫著一個曾是我幼年玩伴的故事，猶如我可以觸摸到他的脈膊，聽到他的感嘆，我開始放心想描寫農人的實況。鍾肇政先生適時來信邀稿，於是我寫了第三篇的「打牛浦村」——〈笨仔與貴仔的傳奇〉，投給了《台灣文藝》，這篇小說讓我對農村實況的描繪有了更深的經驗，並讓我學得了如何反映農村人物的挫敗心情，並把農村社會聯結起來。同時在一個故事

裏使用了兩個等量的人物做為故事的主角，我相信這是我所獨創成功的小說型式。我隱約地感到我已進入了農村的深層現實了。然後我萌發了更大的野心，想整盤將一個農村的所有者都寫進小說，就像挖掘古址一樣，將之纖毫不損地呈露出來，我寫了〈糶穀日記〉，人物變成所有村莊的人，我不須要虛構，因為本來它就是如此，就如同形像隱藏於木石裏面，我只需順其紋理劈砍，雕像自成。〈糶穀日記〉更接近於苦悶的現實，取材於我的村莊所發生的一件騙穀案，我的小說會被人所接受，就因為這一系列小說的緣故。許多人在閱讀「打牛湍村」時受到衝擊，他們認為打牛湍村已將台灣鄉土文學推向一個水平，為鄉土文學立下了一塊里程碑，可是直到現在，我仍不明白為什麼「打牛湍村」被人接受的真正原因，也許是它的真實帶給人由衷的感動吧，有些人類學者還認為應將〈糶穀日記〉當成是一篇人類學的著作來看，他們相信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也不過如此。其實該知道截至寫作「打牛湍村」止，除了四年的大學及一年的教職，整整有二十年以上的時間，我沒有離開農村一步。

一時還沒有辦法去確定「打牛湍村」是否會被接受時，我對寫實文學已倦了。也許如果我是一個創造力不夠的人，我一定會堅持在這種農村小說下功夫，寫下一篇又一篇的大同小異的小說，但我說已經倦了，除了我想再開拓創作的新領域外，那時我發現寫實小說不可能帶給我心靈上的解放，而苦悶的現實卻只能令作者更苦悶，當中一點解救的效用也沒有，而

我寫小說的目的顯然不是這樣。在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我就停筆，當時我的〈笙仔和貴仔的傳奇〉仍未得獎，而〈耀穀日記〉還藏在我的行囊中呢！而我已轉向去追求心靈的解放，嘗試去走浪漫主義文學的路子了。

### ③ 浪漫主義時期

這是指〈岬角上的新娘〉、〈海與大地〉、〈金貓港的故事〉、〈港鎮情孽〉、〈我看見櫻花樹下的老婦〉、〈漁仔寮案件〉、〈狹谷中的白霧〉、〈花城悲戀〉、〈等待燈籠花開時〉……這些小說。促使我會寫這些短篇故事的原因，如我已說：「我想求一些心靈的解放。」因為現實是苦悶的，過份地凝視著它，造成了我的負擔。我必須把自己放逐到一個美麗而帶有若干異地風味的世界中去解放我自己。

提及浪漫主義，我們多半都知道，那是文藝史上一個古老的流派了。它在哲學上受教於康德所提出來的認識論，康德相信人的直覺、感情、信仰也是求知的工具，而不一定只是理性方能求得真知。浪漫主義歌頌自然、反對虛偽崇智、追求唯美、抒發感情、崇尚英雄、抗拒理性。在歐洲的社會發展史上，是受駭於法國大革命的災難而興起的反動浪潮。與其說浪

浪漫主義是提倡人的感情和直覺的自由表現，倒不如說是爲逃避現實而產生的。在當時，我並不知道浪漫主義的內含，也不會曉得這些小說的本質是浪漫的，事實上要等到若干年後，當評論家（諸如張系國氏）說這類小說是浪漫文學的時候，我才知道我寫作了不少這一流派的小說。

當時我的確是在心靈裏把自己流放了，我統合了半虛構與半真實，經營著綺異的小說。心靈渴求解放，使我不得不如此做，在這裏，我不得不要提及那年我們的部隊所發生的一件極其慘怖的事：

在海岸線，那兒有一個屬於我中隊的班哨，由大約十五個老士官組成。班哨位於每一個小村內，面對著大海，有著狹長的沙灘、遍地的黃蟬花以及椰子樹，副熱帶的陽光燦爛美麗。在一個裝備檢查的日子，我們正在距離班哨有二公里遠的中隊部忙碌，槍響了。即使距離有二公里，但聽到的人都說：「好響亮的槍聲啊！」不久，我們的隊本部接到了班哨出事的消息。我和二個同期的預官立即攜了槍，騎了機車，趕往海邊班哨，整個村莊都騷動了，軍警包圍了班哨，隔離了民衆，狀況極爲緊張。我們得悉一個精神異狀的老士官開槍射殺了班兵及漁民，正躲在班哨後的掩體處，負隅頑抗，不肯繳械。他身上攜有四十發以上的M子彈，正漫無目的朝空鳴放。時間在恐怖中度過。黃昏時，上級長官來了，在苦勸以及威嚇